

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交际与面子博弈

——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

COMMUNICATION AND FACE GAMES:
A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郑立华 著

主编 徐真华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交际与面子博弈

——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

COMMUNICATION AND FACE GAMES:

A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郑立华 著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徐真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初明	韦立新	平 洪	刘 岩
刘建达	杨 可	李敬平	余 东
陈开举	陈多友	林秀梅	郑 超
郑立华	章宜华	董燕萍	曾用强
戴桂玉			

总序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是与国运衰微、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勃兴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东西方文明在古老中国不断冲突、碰撞、磨合以及融汇,其剧烈之程度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中前所未见。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东方老大帝国的羸弱暴露无遗。清政府内洋务派为了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创设近代企业,将发展重点放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引起思想文化教育界强烈震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受到空前挑战,“制度”革新摆上核心日程,变法维新运动持续高涨。

此时,时代需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翻译者”,从一开始,外语就承担了读懂历史变迁、推动民族奋起自强的重任。中国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郑观应等,为译介西书,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862年,被誉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外国语学院京师同文馆应运而生,恭亲王奕訢等人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上阐明了建馆的意图:“欲悉各国情景,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作为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同文馆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尝试。此后,得益于外语的译介作用,西学在中国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曾负笈海外的严复翻译了一批重要的西方著作,他的译著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尤其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戊戌变法之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开设英、法、德、俄、日5个语种的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学,且随即合并了京师同文馆,次年更名为译学馆。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兴起,外语专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建基和逐步发展。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外语学科增添了发展动力和活力。

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促进中国近代化为宗旨的海外留学热潮激情涌动。1872年到1875年间，由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提议，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些留美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此后，旨在寻求真知的官派和自费留学逐波激荡。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分布在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文化界等各个领域，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及至民国时期，一批既饱览西学又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海归”执掌大学外文系或者从事外文教学研究。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文化精英，他们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制订学术范式，建立课程体系，名师俊彦辈出，学术声誉远播。从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外文系的一流学术阵容可见一斑。在外文界，前辈不懈开拓进取，后学奋力继承创新，学术薪火相传为外语学科在短短数十年内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1949年以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嬗变，外语学科的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坚冰开始消融，外语学科又受到重视，得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近30多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思潮与思想观念更趋丰富多元，学科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这些变化既拓展了外国语言文学的外延，又深化了其内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明显增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外国语言文学创设了新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这个进程中，我国外语界就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外语教育规划、外语学科发展路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面临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国际理解的艰巨任务。哲学社会科学要繁荣发展，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既不狂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对外国优秀文明成果，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概否定。在纵横捭阖的大时代面前，我国学术发展更需要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外语院校和外语系学科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推进内涵发展、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服务于整个国家学术的发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能力的大幅提升。

国学大师、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读书必先识字”，他自己就精通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还修习过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时至今天，要了解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要感受罗马帝国的辉煌和文艺复兴的灿烂，要领略工业革命和西方哲学的魅力，要把握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律动和人类进步的脉搏，外国语言文学仍然是一种十分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工具、载体和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往往能更易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局域认知等，通过外语这座桥梁得以交流和沟通、发扬和传播，从而提升人类社会的福祉。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为适应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践行“立足平凡、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眼于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这种人才，具有较高的公民素养，“不能仅仅是语言翻译方面的专家，更要在此基础上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成为外语精湛、专业突出、高素质的复合型、复语型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简而言之，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内涵可以用“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现代意识”十二个字来表述，它包含了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命题。首先，大学生要追求自我完善，务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自持，赋予个体生命实际意义。第二，大学生要理性爱国，正确理解与认同传统文化，自觉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进程。第三，大学生要用全人类而非单一国家民族的眼光关注诸如气候变化、核扩散、大规模传染病等国际性难题，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开放的心态。

在全球化语境下，外国语言文学需要遵循学科发展规律，顺应国家政策安排，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提升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进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密切追踪国外学术前沿，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满足于“跟随”和“阐释”，要力争取得突破性、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外文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外语学科优势，整合相关学科资源，开展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为国家外交战略服务。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就外语教育教学和对外交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鼓励个人自由探索又支持学科集体攻关，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广东省政府鼎力支持下组建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就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日本地震海啸等重大问题对广东的影响及对策，组织外语专家和相

关学科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向有关方面提交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对政府施政和企业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走出去”,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环节。外语院校和外语学科可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健全高端国际型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翻译团队,培养造就一批造诣高深的翻译名家,翻译并向海外推介一批中国文化经典和学术精品。要适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加强外语与经济、管理、法律、文化、军事、信息技术等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保持传统语言文学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催生出一批能与国际学术界直接对话、具备学术话语权的新特色交叉学科。加强与港澳台外语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学术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学术组织有关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以“工程”、“项目”和“课题”等名义对高等学校发展实行管理和调控,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重要特色。目前,少数外语院校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拥有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等,这些总体上构成了外语学科领域的学术制高点。200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入选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其系列专著凝聚了“语言·文学·文化”、现代技术与语言教学评估、跨文化交际与管理、翻译研究与实践等研究方向,来自政府的支持为广外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出版“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一来可作项目成果的初步展示,二来以此就教于同行专家学者。

慢工出细活,厚积才能薄发。全球化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样,依然任重而道远。

是为序。

徐真华^①
2011年6月

^① 徐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文学院名誉院长。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3

第一部分 绪论：互动社会语言学

第一章 社会语言学简史	11
第一节 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11
第二节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20
第三节 结语	37
第二章 互动社会语言学概要	38
第一节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渊源	39
第二节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	48
第三节 结语	58

第二部分 背景介说：语言状况与面子观

第三章 巴黎华人的语言状况	63
第一节 “多言现象”的理论	64
第二节 餐馆里的语言状况	67
第三节 东南亚华侨的语言经历	73
第四节 结语	79
第四章 中国人的面子观	81
第一节 餐馆里的一席饭	82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特点	88
第三节 中国人的面子观	98
第四节 结语	119

第三部分 理论探索：语言与社会互动

第五章 言语行为的社会意义	123
第一节 逻辑语义学的“描述意义”	123
第二节 奥斯汀的“施为意义”	124
第三节 格赖斯的“会话含意”	126
第四节 意义的三个层次	127
第五节 言语行为的社会意义	132
第六节 结语	139
第六章 语言与人际关系的调节	140
第一节 会话材料	140
第二节 会话结构	161
第三节 会话模式	193
第四节 标记理论与交际资源	203
第五节 结语	207
第七章 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交际研究模式	209
第一节 贾尔斯的言语调节理论	210
第二节 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交际策略模式	215
第三节 新的交际策略模式	224
第四节 结语	232

第四部分 策略详析：交际与面子博弈

第八章 为自己争面子	237
第一节 在观众面前树立良好形象	237
第二节 在面对面交际中争面子	250
第三节 结语	272
第九章 给对方面子	275
第一节 抬高对方的社会地位	276
第二节 拉近与对方的距离	298
第三节 结语	326

第十章 保全自己的面子	329
第一节 避免丢面子	330
第二节 挽救自己的面子	340
第三节 反抗来自外界的面子威胁	350
第四节 结语	359
第十一章 维护对方的面子	361
第一节 不使对方丢面子	362
第二节 帮助对方维护面子	396
第三节 结语	402
总结语	404
参考书目	408

序言

郑立华教授携厚厚的书稿突然到访,向我介绍他的新作,道出了约写序言的来意。说句实在话,是不是应诺执笔,当时心里是犹豫了一下的,因为我对他所钻研的领域不大熟悉,而且近年来也实在太忙,无暇他顾。于是我问道:多长时间交稿?对方回答:一个月。一篇短短的序言,竟给予30天的充裕时间;再说这也是“赏脸”给我的事情,我怎好意思拒绝,弄得彼此的“面子”都尴尬呢?

我记得,给郑立华的书写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为他与徐真华教授合作的 *Entreprise et communication* (《企业与交际》)写的),但我给他的中文著作作序,这却是头一回。立华留法获博士学位归来,在广外的西语学院创设了跨文化交际的新学科。他多次主持有关的国际会议,为中外的学术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立华一向勤于笔耕,著述颇丰,这次《交际与面子博弈——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书,可说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的归纳、总结与升华。不消说,我是怀着欢欣的心情去分享他这份新收获所带来的喜悦的。也就是说,我沾了一分光,从而提升了自己的“面子”。

学术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创新:新发现、新材料、新方法……都是值得人们称道的。我翻阅立华的书稿,一边思索着从中能吸取点什么,好凭借本人的感受或体会,以先睹者的身份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一得之见,从而使这篇小序不致言之无物。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本书作者的语言学知识深厚。他着重介绍的虽然是“互动社会语言学”,但对现代语言学的各种主要流派都有所触及,条分缕析,纵论其中的贡献得失,能道前人之未道,让读者不但看见“树木”,而且也见到“森林”。如此一来,读者对这棵他“近描”的“树木”自然就有更全面、更真切的把握。

第二个印象是:作者的文笔流畅。全书明白如话,清新可读,无生硬的词句,不故弄玄虚。我曾经在另一本语言学著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类

以‘西学’为基础的著述,常常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行文欧化,读起来佶屈聱牙,带有浓重的翻译腔,仿佛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话。”有些“食洋不化”的人,往往写起洋文来像中文,而写起中文来却像洋文的。立华先前的大量著作都用法文写成,他的法文功力,自不必说。而本书据说是他第一部用中文完成的著作,文字晓畅,清晰自然,可见其语文的功底并未因多年留欧而有所削弱。我欣喜地看到:本书作者正跟随着前辈大师“学贯中西”的脚印前行。

第三个感受是:作者观察入微,分析至细。立华实行“参与式的观察法”,在研究现场做“卧底”长达四年之久,在我的同事当中,就本人所知,能够沉潜下来这样做的,他是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的惟一个。无怪乎本书的素材如此翔实,例证如此丰富。有坚实的原始材料作为支撑,本书的立论推导和结论自然足以令读者信服。

学问中的“学”与“问”往往相辅相成。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学到不少新鲜知识的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待解:

其一,作者对许多例子作了诠释;但怎样才能保证,这就是原说话人的意思,而不包含作者的主观臆测的成分?例如,例 237 中老赵说:“有金子大家分啊。”立华认为这句话的用意是“重新定义事件”,而如果我解释为此句意在调侃或讽刺,似乎也讲得通,那又应该如何分析呢?

其二,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故而,倘若本书能激发一般读者对语言研究的兴趣,吾则无憾矣。”可我读罢全书,更感兴趣的倒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在一定文化框架内以面子为核心的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调节”。我想,这也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吧。从前言所表示的期待来看,作者无疑是把本书界定为语言学类的著作,而如果我从另一角度,把本书归属为文化学的成果,是否也同样说得通呢?

能引起读者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我想立华是不会把我的疑问视为是有损于作者的“面子”的。拉杂地写了以上这些,就算是序言吧。祝愿本书赢得广泛的读者!

黄建华

2011年12月22日于广外校园

前言

撰写本书有两个初衷：一是帮助初涉社会语言学，特别是互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掌握基本的学科理论；二是与该学科的专家学者交流我们在互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心得。

交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其活动大部分都是以交际为居间形式进行和完成的（Saville-Troike, 1982: 249）。“互动社会语言学”就是研究言语交际的学科。“交际”作为动词在法语里是“communiquer”，其词源是拉丁语的“communis”，意为“使在一起”（mettre en commun），“使发生联系”（mettre en relation）。美国心理学家舍格弗伦（A. E. Scheflen）把交际定义为一种行为系统。该系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类、调节与维护，从而打通人际交往的渠道（Winkin, 1981: 157）。这个定义把交际视为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突出了交际的能动性及其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学对交际功能的研究只局限在信息的传递上。传统语言学认为，“交际，说到底，就是让听话人获悉他原先不知道的信息”（Ducrot, 1980: 2）。基于这一观念，索绪尔（F. de Saussure）之后的语言学研究相对忽视了交际过程中个体的地位及其影响（王德春等，1995: 4）。语言仅被当作交际或信息编码的工具，而交际参与者以及交际本身对人际关系所产生的效果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因为这些因素的介入会影响语言描写的有效性与精确性。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16]1982: 323）。在其影响下，语言学家很长一段时间只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而没有进一步探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

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语言学与传统结构语言学分庭抗礼。这门新兴的学科主张在活生生的语境中探究说话人的话语行为及其相关

因素(杨永林、司建国,2003:420),并开始有意将研究的触角伸向身处社会交际现场中的人。但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却过于强调客观环境的作用。似乎个体运用语言不是自主的,而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王德春等,1995:5)。真正把交际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摆在首位的是后来兴起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属于互动语言学,后者认为人类不是语言和文化的被动承载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林大津、谢朝鲜,2003:415);交际中的参与人绝非“社会自动机”(赫德森,[1980]1990:18),不会被动地受制于社会现实,而是能根据交际的目的,主动地去创造或改变社会现实;互动社会语言学是研究交际的社会语言学(Gumperz,1982)。

“互动”概念的提出给传统语言学(包括早期的社会语言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法国语言学家盖热(D. Geiger)称这一冲击所引发的变化既是“富有创意的”(créatifs)——因为各种新思想和提法层出不穷,同时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déroutants)——因为各家学派标新立异,其观点一时间难以统一,真可谓“有多少个社会语言学家就有多少个社会语言学流派;有多少个语用学家就有多少个语用学流派”(1990:23)。尽管如此,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更加贴近社会互动的现实与本质去研究语言,从而使语言研究的角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探讨交际信息的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转向研究参与交际的人之间的关系。

国内学者王德春较早注意到了交际中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王德春就提出语言学在研究语言结构体系的同时,更要研究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研究言语,探索言语规律(王德春,2002:46)。80年代,王德春提出建立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设想,指出:“人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人的相互作用在言语交际中产生”(同上:92)。

本书遵循的正是“将社会的人引进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人的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王德春等,1995:3)的思路。我们的研究将围绕“人们如何利用语言,通过交际调节人际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本书的研究方法较之前人有几大创新之处:首先,我们描写的对象是交际参与者有目的的言语行为。“目的性”(purposive)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正如派克(K. Pike)所言:人类行为(其中言语和非言语既相对应又可替

代)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本质之处是它的目的性(Pike, 1964);其次,我们把交际当作一个能够改变社会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改变人际关系的一种策略行为:“讲话就是交际,交际就是互动”(Kerbrat-Orecchioni, 1990: 12);再次,我们以说话人为研究重点,视说话人为一个有能力根据情景选择合适交际策略的理性行为主体;最后,我们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把语言当成一个能够给个体提供种种行动选择的策略资源库。

本研究基于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描写日常互动中的交际行为。“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不一样,交际——无论是言语的或是非言语的——脱离了它所处的社会、族群和文化便没有意义”(Argentin, 1989: 32)。所以,我们主要考察中国文化氛围中国人的交际行为以及跨文化语境下中国人与外国人互动的行为。

第二,通过对交际行为的描述,透视隐藏在中国人交际行为背后的文化准则,进一步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为构筑社会生活秩序和规范的奠基石,文化准则细目繁多,我们仅取对中国人交际行为影响最深的面子观作为主旨,重点阐述中国人在交际互动中如何争得面子、给对方面子、保全自己的面子以及维护他人的面子等富有中国特色的面子策略。林语堂讲到中国人的面子观时说:“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林语堂,1990:183)。给“面子”下定义并非易事,虽借助词典也难觅令人满意的答案,或因其实在“抽象而不可捉摸”罢了。我们大致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社会成员希望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取的一些正面价值。我们认为,作为文化范畴,面子既是行为“目的”,又是行为“动因”。“目的”(l'en vue de)指向未来,是行为要达到的目标,而行为本身只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动因”(le parce que)指归过去,构成行为的原因或理由(Schutz, 1987: 252)。

第三,从中国人的交际行为管窥中国文化。如果说,文化准则制约着交际行为,那么,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把交际行为视为文化准则的一种表达,可以通过研究某一社群的交际行为来了解该社群内部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运作模式。正如布朗(P. Brown)和列文森(S. C. Levinson)所言,发现

语言使用的原则,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发现了社会关系建构的原则(Brown & Levinson, 1987: 55)。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 Eco)也指出,人们必须把文化现象当作一种交际现象来研究,因为文化现象是交际的内容,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的意义。他认为,如果从交际的角度切入研究一种文化,该文化可以被更好地了解(Eco, 1972: 28—29)。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人的交际行为来审视中国文化,正如可以通过中国人的饮食行为、中医、中式建筑等来研究中国文化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来自我留学法国的博士论文^①,这是我首次以汉语为载体将其中的内容呈现给读者。书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语料是我留法期间在巴黎一家大型中餐馆通过“参与式观察法”^②调查(1990—1994年)收集来的,另一部分语料则来自我日常生活中记录的例子。为了保持语料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书中依然沿用当时的一些叫法(如用“法郎”而不是用“欧元”)。所谓“参与式观察法”,就是“卧底”餐馆当服务生,在别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边观察边私底下把餐馆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或用小型录音机或用小本子详尽记录下来。我以此方法最终累计收集到了两千多个真实的交际片段。

“参与式观察法”的调查方式既有理论的根据,又有基于现实的考虑。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及其形式、组织与结果,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对应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较为合适却长期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社科类的研究也必须使用自然科学中客观量化分析的方法。另一些人则坚称社会科学的观察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观察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须知,这个世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有特定的意义的(Schutz, 1987: 79)。所以,社会科学应借

① 该博士论文(法文)曾分两册先后在法国巴黎出版,书名分别为 *Les Chinois de Paris et leurs jeux de face* (巴黎华人及其面子策略)(Harmattan, 1995)和 *Langage et interactions sociales* (语言与社会互动)(Harmattan, 1998)。

② “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首创。它要求研究者亲自参加被研究对象的相关活动,从而为自己创造机会以建立和获得第一手文化经验。

助一般人对世界的共有知识来研究和解释人类行为(同上:42)。我们认为,“参与式观察法”是实现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解释当事人的交际行为的有效方法,因为在研究过程中,观察者已经与被观察对象融为一体。他与被观察对象同处一个语境,拥有与其大致相同的行为动机和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观察者为行为的解释更接近社会现实,而且有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检验其作出的解释是否符合事实。由于使用了“参与式观察法”,本书所使用的语料有两个特点:一是记录了不少“我”自己参与的例子,因为在这种调查法中,观察者不仅是研究者,而且也是被研究对象之一;二是很注重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因为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往往意义最为丰富,正如比利时社会学家温金(Y. Winkin)所言,“最具意义的社会互动常常发生在最平常的交往之中”(Winkin, 1981: 94)。

本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下分两章。第一章旨在回顾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历程;第二章简述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第二部分介绍本书的调查对象,下分两章。其中,第三章描述巴黎华人的语言状况;第四章讨论中国人的面子观。第三部分是理论探索,围绕“语言与社会互动”分三章展开:即第五章探寻语言的社会意义;第六章从交际资源的角度研讨语言的社会功能;第七章试图建立一个研究交际活动的新模式,并为第四部分的论述做铺垫。第四部分以“交际与面子博弈”为题,结合调查的素材,并参照第七章所提出的交际模式分析中国人在面子文化驱动下的交际行为与策略——“为自己争面子”(第八章)、“给对方面子”(第九章)、“保全自己的面子”(第十章)和“维护对方的面子”(第十一章)。

我始终认为,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既鲜活又多彩,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应该是生动活泼的。故而,倘若本书能激发一般读者对语言研究的兴趣,吾则无憾矣。

最后,我要表达对导师卡尔维(Louis-jean Calvet)先生的感激之情。我在法国留学期间(1988—1995年),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光阴似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导师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活跃在法国社会语言学界。他说他的词典里没有“退休”二字,其对学术的执著精神令学生敬仰。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王淑艳老师为本书的资料整理所付